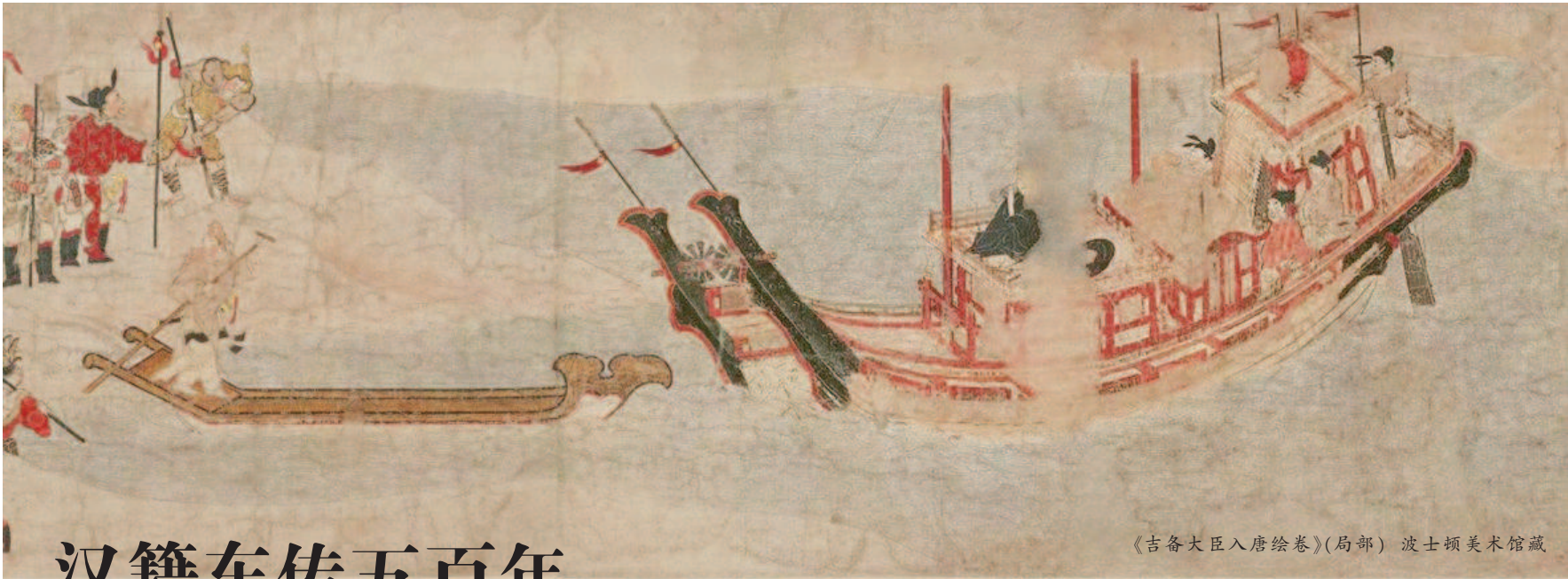




《吉备大臣入唐绘卷》(局部) 波士顿美术馆藏

汉籍东传五百年

——漫谈唐以前中日之间的“海上丝路”

孙猛

长安往西,“沙漠丝路”,一队队骆驼跋涉在滚滚黄沙之中,行旅人为我们在通往西域的交通的咽喉锁钥留下了许多珍本遗书。长安往东,“海上丝路”,一艘艘舳舻颠簸在滔滔波涛之上,航行者为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东瀛岛国留下了不少佚存汉籍。今日,我们把西传途中的敦煌遗书跟东传日本的汉籍西东贯通,一幅地球格局的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。

两条传播中华文明的“丝路”

先看几个有趣的例子。

《王勃集》,敦煌文献S.0555有佚诗,日本今存有初唐钞本。

隋代小学家智𡩊《楚辞音义》,敦煌文献P.2494,隋代写本。存八十四行,凡释《离骚》经文一百八十八、注文九十六、二百八十三字,是研究《楚辞》以及王逸注的珍贵文献。此书被《文选音决》所引,四条(《吴都赋》一条,《离骚》两条,《招隐士》一条),见日本古钞本《文选集注》残帙。

马仁寿《开蒙要训》,一部蒙学读物,在敦煌文献中,其件数仅次于《千字文》,敦煌本《杂抄》(P.2721a):“《开蒙要训》,马仁寿撰之。”成书于日本宇多天皇宽平三年(891)的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也著录了此书。

《正名要录》,一部规范文字书写、使用的“字样书”著作。今存敦煌文献S.0388残卷,同时见于藤原佐世《日本国见在书目录》,而且被跟他

的同人日本僧昌住所撰、成书于昌泰年间(898-901)的《新撰字镜》所引用。

此外,还有《王梵志诗》《老子化胡经》《兔园策府》《文馆词林》《珣玉集》《游仙窟》等,也同存于敦煌文献和东传日本的汉籍。

日本著名汉学家川口久雄在提到这个现象时说:“且不论,这些书,当时的日本人读到什么程度,但它们同见于唐末鸣沙石室的遗书和王朝秘府藏书,这点令人寻味。”

确实,我们不妨“寻味”一下:以长安为中心,大致分别距离敦煌、奈良(京都)两地两千公里。同一部书出现在相距四千多公里的敦煌和奈良(京都),这生动地说明了中华文明的强大的魅力与影响力。

再进一步“寻味”一下:长安往西,“沙漠丝路”,一队队骆驼跋涉在滚滚黄沙之中,行旅人为我们在通往西域的交通的咽喉锁钥留下了许多珍本遗书。长安往东,“海上丝路”,一艘艘舳舻颠簸在滔滔波涛之上,航行者为我们在大洋彼岸的东瀛岛国留下了不少佚存汉籍。今日,我们把西传途中的敦煌遗书跟东传日本的汉籍西东贯通,一幅地球格局的传播中华文明的历史图画呈现在我们面前,生动而壮观,令人感动不已!

这里我想说的是,今天我们所讲的“丝路”,无论是“沙漠丝路”也好,还是“海上丝路”也好,应该既是沿线各国经贸往来的通道,也是文化往来的通道,是传播先进的中华文明的通道。

1877年德国地理学家费迪南·冯·李希霍芬所创建的,形象、贴切得无以替代的“丝绸之路”这个词语,本来的意思确实指两汉时中国与中亚、印度之间沿线各国经贸往来的重要通道。其“丝绸”借指中华物质文明,但是沿用至今似乎已经不仅仅局限于物质,而是涵盖了中华物质与精神文明。

有的学者提出了“书籍之路”的概念,撰文说明“丝绸之路”与“书籍之路”的区别,把“丝绸之路”的“丝绸”直解为“丝绸”,用“书籍之路”代替了“海上丝路”,颇有创意,然而,“海上丝路”应该包括物质、精神两方面,似乎还是用“丝路”为好。

经由“海上丝路”流传到日本的,除书籍、书迹之外,



经由“海上丝路”流传到日本的,除书籍、书迹之外,还有诸多器物,深刻影响了日本本土的文化发展。图为极具中华文化色彩的日本正仓院收藏的若干文物。

图见正仓院官网

还有礼器、乐器、武器、食器、文房具、游戏具、测绘器具、饰物、织物、药物等,这些都是中华文明的传播。例如,吉备真备元正天皇养老元年(717)第一次入唐,留唐十七年,归国后献书朝廷,事见《续日本纪》卷一二天平七年(735)四月廿六日辛亥:“入唐留学生从八位下道朝

臣真备献《唐礼》一百卅卷、《太衍历经》一卷、《太衍历立成》十二卷、测影铁尺一枚、铜律管一部、铁如方响写律管声十二条、《乐书要录》十卷、弦缠漆角弓一张、马上饮水漆角弓一张、露面漆四节角弓一张、射甲箭廿只、平射箭十只。”